

铁道游击队老队员黄岱牲(下)

◆ 黄力彦

军令如山。我父亲知道上级决定已不可更改,要顺利完成任务,只能去找姬庄的“两面保长”姬茂喜想办法。他表面上是伪保长,实际上为抗日做了不少事情。可是他告诉我父亲,他也不认识姬庄据点里新换防的伪军,只听说这群伪军的头目是个中队副。我父亲就派他去伪军据点探探虚实,然后想办法把那个中队副请到家里来,款待并教育他。姬保长答应前去一试。

隔天清晨,我父亲带领三名队员悄悄来到姬茂喜家里,静候伪军中队长副的到来。将近中午,果然伪军中队长副在姬保长的陪同下,只带了个卫兵就来到了姬茂喜家。他们刚坐下,我父亲就掏出短枪,一个箭步冲过去,用枪口顶住了这个伪军中队长副,低声喝道:“不许动!”这个伪军中队长副顿时吓瘫了,那个卫兵也已经被缴了械。我父亲告诉他:“我是飞虎队的。”接着,我父亲为了稳定那家伙的情绪,先同他拉家常,得知他家是滕县的,在青帮的“家礼”上,辈分是24。我父亲随口说道:“我是22,还比你两辈,咱们还是老乡呢!”随后,我父亲对他讲了一番抗日救国的道理。那家伙连连点头称是。临走时,我父亲对他说:“枪还给你们,明天晚上我要到你们的据点去看望弟兄们。”那家伙赶紧点头说:“欢迎光临!”

第二天晚上8点多钟,护送陈毅军长的先遣队到了,我父亲立即带领几名队员到姬庄伪军据点。伪军中队长副急忙出来迎接,我父亲开门见山说:“等一会儿有几个兄弟要到铁路西面去办点事,请老弟行个方便。”伪军中队长副听了非常客气地说:“没问题。”他命令值班的伪军士兵打开探照灯,在铁路两旁很深的封锁沟上搭了小桥,然后,我父亲和几名队员就与伪军中队长副一起登上炮楼,注视着公路。

过了一会,我父亲看到杜政委、

大队长带领队员们护送骑着骡子的陈毅军长过来了。当骡子走到封锁沟前时,陈毅军长敏捷地跳下骡子,稳健地走上小桥过了封锁沟,然后大步跨过铁路,和护送队伍很快地消失在铁路西面的夜幕之中。

等护送队伍走出半里地后,我父亲带领几名队员离开姬庄据点,担任护送队伍的后卫,向西疾行,一直来到微山湖边。这时,他看到陈毅军长正在向大家一一告别。然后,我父亲和战友们目送着陈毅军长坐的船驶向远方。

田沅牺牲令他终身遗憾

父亲生前常对我们说,在鲁南铁道大队期间,对敌斗争很残酷,有一件事他终身难忘,也是终身遗憾。那是在1943年春天,上级命令我父亲护送田沅过津浦铁路。田沅是著名音乐家田汉的弟弟。他是从上海出发,途经鲁南,奔向延安。

当时日伪军正在重点进攻抗日根据地,交通要道严密封锁,到了晚上就实行戒严,日伪军龟缩在据点里,用探照灯照射公路和铁路线,还不时地打冷枪,用以壮胆。我父亲只能请田沅暂时住下,等待时机越过铁路。因田沅和我父亲都是知识分子,年龄相差不多,所以很谈得来,十分投缘。

住了一周,看看形势略有好转,我父亲就带着田沅趁着天黑,悄悄地行动起来。他们绕过了日伪军据点,正要通过铁路时,突然飞来一颗流弹,偏偏击中了田沅。我父亲马上背起田沅就跑,赶了几十里地,送到鲁南军区卫生队。谁知经过三天三夜的



铁道游击队向老百姓宣传抗日(剧照)

抢救,还是未能将田沅从死神手里夺回来。这三天三夜,我父亲一直陪伴在旁。田沅在最后时刻,将他的一块欧米茄怀表送给我父亲留作纪念后,就在我父亲的怀里闭上了眼睛。我父亲禁不住失声大哭,悲痛万分。

我父亲在此前此后,与战友们一起,曾安全护送过罗荣桓、萧华、朱瑞、陈光、陈毅、范文澜、胡绳等党政军领导人和其他爱国志士以及群众上千人,除田沅外,没有一人牺牲,因此在许多年后,我父亲对田沅的牺牲依然十分内疚。

我父亲在临终前,将田沅送给他的欧米茄怀表交给了我,并对我母亲说:“这块表留给大儿子,作为传家宝永远传下去。”

五十里奔袭歼灭敌寇

鲁南地区的抗日斗争非常残酷。我父亲曾率领短枪中队参加过各类大小战斗数十次,打得敌人魂飞魄散。

1943年6月15日,鲁南支队在彭口闸村召集各大队和武工队负责人开会,地点是在一个地主的大院里,院子后边是又深又宽的运河,铁道大队派出部分队员担任警戒。午饭后,与会人员正准备继续开会,突然,数百名装备精良的日伪军悄悄窜进闸村,妄图包围会场。中队长徐广田和指导员颜耀华发现敌情后,一面鸣枪报警,一面组织队员迎头痛击来犯之敌。这时日伪军的机枪已经对着大门,副大队长兼中队长王志胜正准备拉开大门冲出去,被我父亲猛地一把拉过去。他指挥战士们与门外日伪军激烈交战,掩护与会人员翻越墙头,安全转移。

然后,我父亲带着几名队员绕到日伪军的后面,与徐广田指挥的部队形成前后夹击之势,打得敌人晕头转向,以致怀疑铁道大队早有准备。我父亲接连打死了几个敌人后,捡起一挺机枪就迅速撤离。日伪军不明情况,一时不敢贸然进攻,我父亲和战友们就趁机一路奔跑赶上了大部队。这一仗不仅使日伪军扑了个空,而且缴获了一挺机枪,我父亲因此获得了鲁南军区颁发的三等功奖状。

1943年底,鲁南支队根据情报,准备在路上伏击日伪军,但日伪军却并没有走我们预先埋伏的路线,而是走了相隔四五十里的另外一条路。为了消灭这股敌人,必须迎头赶上。我父亲马上带领几名队员骑上四五辆自行车,每辆自行车后座上,坐了一名机枪手,抱着机枪和子弹。大家轮流骑车奋力赶路,大部队则在后面跑步追赶,经过几小时的长途奔波,到达设伏地点后,大队长刘

金山累得口吐鲜血,队员们也都上气不接下气。但是,一看到钻入伏击圈的敌人,指战员们都忘记了疲劳,个个精神抖擞,马上投入战斗,干净、彻底地歼灭了这股敌人。

后来,我父亲因对敌斗争的需要,奉命转到其他方面工作,但他对铁道大队始终十分关心。

晚年缅怀先烈常常潸然泪下

父亲在晚年常常深情地对我们说,在抗日战争期间,铁道大队确实给了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,开辟了一片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,但也牺牲了许多指战员,如洪振海(第一任铁道大队大队长)、赵永全(铁道大队副大队长)、文立正(第二任铁道大队政委)、孟昭煜(第三任铁道大队政委)、张鸿仪(第五任铁道大队政委)、徐广才(铁道大队短枪队队长)、曹德全、曹德清、李云生和朱其金等。每次说到这里,他都会心情沉重,热泪盈眶,并叮嘱我们要万分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。

有时,父亲会自豪地告诉我,铁道大队还是那个革命大熔炉,它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立培养锻炼了一批军政干部,如郑阳(原二炮副司令员)、杨广立(原南京军区副政委)、杜季伟(原济南军区炮兵司令员)、刘金山(原苏州军分区司令员)等,以及一批地方干部,如靳怀刚(原上海市人大副主任)、王志胜(原山东枣庄市人大副主任)、赵明伟(原名赵若华,原杭州上城区区长)等。我父亲进城后,先在上海市肃反委员会工作,后调往华东化工学院、上海第一医学院以及上海市卫生局担任领导职务。

我父亲虽然在鲁南铁道大队工作只有一年八个月,但是,当我问他“您这一生中,什么阶段过得最有意义”时,我父亲会毫不犹豫地回答:“在铁道大队打日本鬼子的时候。”(摘自《上海滩》2017年第8期)

他们的上海前夜

王唯铭



35. 龙门书院里的阅读

就在这时,龙门书院出现在李平书的面前。先介绍一下其时四处勃兴的书院。背景是如滔滔洪水的“洪杨之乱”,尊崇所谓基督教文化的长毛们,在一路暴动中,肆意焚毁着传统书院,砸烂着圣贤牌位,他们用野蛮的暴力来显示自己的文化纯洁性。洪杨之乱平息后,清帝国无论高层、中层,都感觉到文化重建的迫切性,重建,不仅是对长毛们将近14年来在中国大地上胡作非为的拨乱反正,也隐含着对其时已来势汹汹的西方文明作极力阻挡,同时,帝国高层凭借书院培养出帝国急需的经世之才。书院由此在中国各地纷纷兴起,譬如,阮元在杭州办了诂经精舍、在海宁办了安澜书院、在广州办了学海堂;陶澍在江宁办了惜阴书院;而黄体芳在江阴办了南菁书院,如此等等。说到上海,当时帝国中最有才干之一的官员丁日昌,提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构想的男人,于1865年提出开办龙门书院设想,正式完成则是上海道台应宝时,1867年,他拨出公家银子一两万,在吾园开出龙门书院。

经母亲胡氏的强烈指点,1873年冬天,李平书以第四名资格考进龙门书院,可以想见其学识、考功不是一般的好。

对李平书作深入研究的专家们无一不强调龙门书院对他的重要性,那么,这书院究竟重要在哪里呢?先是老师不同凡响。

进入龙门书院时,李平书相遇了书院山长刘熙载。刘熙载,人不是一般人,校长也不是一般校长。出生于江苏兴化的他,早在1844年,五口通商之后第二年,以绝对才学高中进士,随后就成为帝国文化领域最高层面中一员:翰林庶吉士。不久,又被授为编修,又不久,担任广东学政,掌管科举选拔大权,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之一。1867年,刘熙载来到第一上海,担任龙门书院山长(今日校长)一职时,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儒,不是一般儒生,是大儒。

既然大儒,就有独特的办学宗旨,下面20字正是龙门精髓:地属濒海,中外杂处,闻见易纷,砥柱中流,尤须正学。

尤须正学是关键。

刘宏儒对学生要求是“才出于学,器出于养”,是“学必尽人道”,是“士人所处,无论穷达,当以正人心、维世道为己任,不可自待菲薄”,是“学者必先品行,次及文学。学术事功,原委有序”,是“有志之士不以遇合之心夺其学问之实”,如此等等。也因此,这个宏儒在十权威版的《清史稿》中被如此品评:“自少至老,未尝作一妄语。表里浑然,夷险一节。主讲龙门书院十四年,以正学教弟子,有胡安定风。著《持志塾言》二卷,笃近切实,足为学者法程。”

“自少至老,未尝作一妄语”,说法有点夸张,但刘熙载作为正人君子,恐怕无人能够质疑。在这样的大儒教导、提点、培养下,李平书怎么会成为龙门书院所要求的“中流砥柱”?

对李平书探入,让李平书在龙门书院尤其得益匪浅。

龙门书院有什么呢?有很多新学新知,譬如“舆地之学”,有这样两本书,对李平书产生了极大影响,让他成为19世纪70年代抬眼看世界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中的超前一个,当然,实事求是说,比较年轻,他晚了许多,比之容闳,更是差了不少。

这两本书,一本是魏源的《海国图志》,另一本是徐继畲《瀛环志略》。两本书,说的是世界地理,其实远远不止,《海国图志》的核心思想在于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,让帝国自太平洋天崩地裂之后,因自强运动而让王朝多生存了半个世纪的自强运动,它的精髓思想便出自于此;而《瀛环志略》的要害在于解构了这样一个顽固的理念:中国便是中央之国,便是世界中心,无论器物或意识形态,它都高高在上,居于任何民族的前列和上层。中国并不是居于世界中心,儒学也不能够包打天下,尽管,对中华民族来说,它的伟大性毋庸置疑,但面对基督教文化,它不就没有很尴尬、很不幸的一面吗?李平书接受了这些新知吗?应该是的。他还读了顾炎武的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,读了《皇舆全图》,他一定还钻研了“汽机新制、开煤要法、化学分原、航海简法、器象显真”,龙门书院里的反复阅读,让李平书的眼界、胸襟都有了以往不曾有过的辽阔展开。

36. 黑太阳

半年以后,张秉贵站在了东京地方裁判所的原告席上。

“法官阁下,贴着太阳徽的旧日本军轰炸机给重庆城带去的,不仅仅是一颗颗夺人生命的炸弹、燃烧弹,还有一颗‘黑太阳’。这颗‘黑太阳’窒息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,造成无以计数的家庭家破人亡。到了该彻底清算这笔反人类的战争罪行的时候了,否则,日本的太阳终将蒙羞。”

法庭里寂静下来,人们似乎还在回味梅泽一郎律师的话。该轮到被告方律师松本茂出场了,他踱步到张秉贵面前,问:“原告,你告诉我,那天大隧道里你的家人,还有其他的死难者,到底是怎么死的?”

张秉贵舔了舔干涩的嘴唇说:“是……是闷死的嘛。”“为什么会闷死呢?”松本茂不慌不忙地问。“人多个嘛,又拥挤嘛。”“为什么要拥挤?”“为啥子挤?因为你们日本飞机来轰炸我们么,我们只有躲进防空洞才能保命嘛。”“原告,那个防空洞有三个出口,对吧?”“对。”“每个出口都堵死了吗?”“都堵死了。只有那有炸口死的人多些,有的少些。”“原告,那天的炸弹落在哪些洞口了吗?”“没得。”“有炸弹击穿了你们的防空洞吗?”“没得。”“有日本飞机的机枪扫射、封锁了任意一个洞口吗?”“没得。”“那他们挤什么呢?”松本茂忽然提高了声音。

“我想起来了”,张秉贵忽然大声高喊,“我听洞子里出来的人说,日本飞机投了毒瓦斯,人们才开始互相拥挤的。”这是原告证言中本来没有的内容,张秉贵对被告方律师穷追猛打,觉得自己丢了重庆人的脸了。他想要为大家、为自己扳回一分。

法庭里安静了半分钟,梅泽一郎律师心里直叫“坏了坏了。”旧日本军在重庆大轰炸中有没有实施细菌战的问题,律师团正在调查中。帮中国人打的湖南常德细菌战官司进行了十来年,细菌战受害者可不像大轰炸受害者,有比较明显的人证和物证,取证之艰难非常人可以想象。梅泽一郎律师不是不知道重庆大轰炸中日军投放了细菌武器的传闻,但目前他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。没有

结论的事捅到法庭上,只会让自己更被动。

松本茂律师是个何其精明的人,他看出了梅泽一郎律师的犹豫,对方的上诉证言里本来就没有“毒瓦斯”的内容,他判定这是原告随意性的发挥,这等于对方自摆乌龙。天赐良机,他不会轻易放过。

“原告,你听说?听谁说?”“大隧道惨案发生后,好多活下来的人都在说,洞子里有毒气。”张秉贵没想到对方律师跟他当真了。他的阵脚乱了。“你都不知的事情,怎么能在这里指控呢?你前面陈述的那些事情,又有多多少少是真实的呢?法官阁下,原告的证言前后矛盾,不可采信。且原告有作伪证的嫌疑。”

“法官阁下,刚才原告方律师说是旧日本军的轰炸造成了重庆的大隧道惨案。不错,那天重庆上空确实有轰炸,重庆的大隧道也的确发生了死伤甚多的惨案,我承认这是一起不幸的事件。但它的真相又如何?第一个真相是:重庆文史单位公开发表的一些关于‘六·五大隧道惨案’相关文章的数据显示,这个巨大的公共防空洞最大定员为6555人,但惨案发生那天大隧道里至少涌进了一万至两万人。第二个真相是:不是没有通风设备。在一份国民政府一个官员的报告中说,本来惨案发生前半个月就已经安装好了一台通风机,但因工程处未能约到某个电机工程师,工程处的一个官员以自己不懂电机原理为由,自行终止了验收。第三个真相是:在《陪都市民为6月5日敌机夜袭发生隧道惨案给国民政府各机关团体的呼吁》中,有这样一段关于防空洞里情况的描述:避难民众进洞三时许,空气不能流通,出汗发热,空气阻塞,人人愿意出洞透换空气,以免气塞待毙之惨痛!殊知防护团及宪警将洞门封锁,勿许外出透气!况且锁洞之人,离洞他去。第四个真相:根本没有毒气弹,惨案的发生是中国人自相拥挤造成的,就连原告本人,不是也爬到其他受难者的头顶上去了吗?”

以能言善辩著称的梅泽一郎律师彻底被击垮了,他怔怔地望着对方,一时连“反对”的话都说不出来了。这是他律师生涯里的滑铁卢。

重庆之眼

范稳

